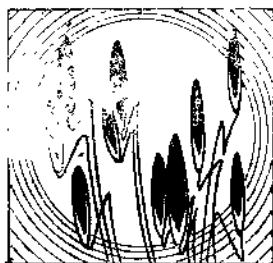


五味集

謝云 著





谢 云 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五味集

谢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91,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6-00408-9

I·150 定价：1.90元

自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主要是1986和1987两年间所写的短文的一部分，大致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几篇，是前几年所写，但未收入《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的。现在看看，似乎还有点意思，便也收了进来，排在最后。

邦有道则庶人议，庶人议则邦有道。这几年杂文的发展虽也有过起伏波折，但总的说是日见其兴旺了。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杂文的功能、时代特征、艺术表现等等的议论，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在我，大抵只是有话想说，而又自以为这些话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和社会进步，而且并非全是陈言套语的，便写了出来，很少考虑是否符合论者的尺度。如果说此外还有一些什么要求的话，便是力求文与人，言与行之间，不要背离得太远。

虽说杂文也可用于歌颂，但就其主要功能而

言，恐怕还在于揭示和抨击社会上丑恶和落后的东西，以促其死亡。扶正祛邪，祛邪，正是为了扶正，实际也就起了扶正的作用。灭虫锄草与浇水施肥，对于植株的茁壮成长，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杂文作者的文与人、言与行之间能否一致的问题。杂文作者虽非什么领导者、教育者，但他的文字既要祛“邪”，他的为人，便理应比较的“正”，这才有道义的力量。“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杂文作者不能学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样。

我自知缺点甚多，而又要执笔为文，这就产生了矛盾。我的办法是“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大致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譬如说，如果自己偷了东西，就决不指着别人的鼻子骂他是贼；如果自己正削尖了脑袋钻营什么官位，也决不堂而皇之地去指斥别人是“官儿迷”。这是一种藏丑法，自然并不神圣，但至少可以心安一点。二是凡自以丑恶并加以攻击了的行为，自己以后便特别加以检点和约束，不去做那样的事，以免被人指着背脊并投过来轻蔑的冷笑。

至于对旧思想、旧意识、旧习惯的批评，却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因为，我觉得，杂文作者只

要不以圣人自居，并愿审视和改造自己的灵魂，
当他把笔尖指向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正是在荡
涤自己心灵里的尘垢。如果一定先要自己一尘不
染，那就只好大家搁笔。

编完这本集子，我希望以后自己能有所长
进，除了作文以外，还包含着做人。
是为序。

1988年1月6日

目 录

自序.....	(1)
鲁迅的一句诗.....	(1)
戒石铭.....	(4)
也说“难得糊涂”.....	(7)
早叫的公鸡.....	(10)
“打熟张”.....	(14)
鼠与器.....	(18)
“印象学”考.....	(21)
名人、名家与名篇.....	(24)
根的事业.....	(27)
正确的空话.....	(31)
“我们”又怎样?I.....	(35)
涂抹术.....	(39)
无形的锁链.....	(42)

悲“弃儿”	(46)
听话引来的话	(50)
两个白居易熟可爱	(54)
没有瞄准靶子	(59)
围墙	(63)
说“失身”	(67)
“某公”与“诸公”	(72)
“信教”与“吃教”	(76)
鲁迅的自我解剖精神	(80)
对话——理解的渠道	(84)
一幅名画的遭遇	(87)
两首古民谣	(90)
哭既无益，笑也不必	(94)
“崇高”的道德与“渺小”的法	(99)
乐甚，苦甚，皆大欢喜	(103)
传记的生命	(107)
按棋理下棋	(111)
失误的价值	(114)
乱谈“钱”	(117)
利弊篇	(122)
是非经	(125)
便做“苍蝇”又何妨	(129)
“潜人才”与“显人才”	(133)

肩膀·····	(136)
县长家的院墙·····	(139)
我看贾宝玉·····	(143)
现代道时观·····	(147)
睁眼看自己·····	(151)
再论睁眼看自己·····	(154)
三论睁眼看自己·····	(157)
行路难·····	(161)
也说杈子与屁股·····	(164)
“从来如此，便对吗？”·····	(168)
“投入产出”说阅读·····	(173)
“好订先生”三论·····	(176)
“三光主义”·····	(183)
瞭望·观察·····	(187)
说“瞎”·····	(190)
何必油“近墨”·····	(193)
说“靠枕”·····	(196)
人与言·····	(199)
面面观·····	(202)
“任之”，“任之”·····	(206)



鲁迅的一句诗

“一阔脸就变”，鲁迅先生的这句诗，是讽刺旧中国那些反动军阀政客的。说是讽刺，其实也是写实。但这“一阔脸就变”的，却也并不限于当年的军阀政客之流。陈涉是个农民，后来造反称王，阔起来了，往年的穷朋友来看他，说了几句昔日故事，他不但变了脸，而且竟砍了人家的脑壳。阿Q只是进城在白举人府上帮了几天忙，靠“三只手”发了点小财，回到未庄，那脸竟也变了，碰到王胡，居然照着他后颈窝直劈下去：

“噤！”所以，脸随阔变，实在是旧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自然，人阔了，而脸始终不变的人也是有的，那便被称为不以富贵骄人的贤者。

一个人阔起来了，不但他自己的脸可能变，别人的脸也往往会随着发生变化。苏秦出游，穷

困而归，遭到一家人的讥嘲，及至身佩六国相印，再次还乡，便出现了“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待取食”那样的情景。《儒林外史》里，范进向丈人胡屠户借钱去乡试，遭到一顿臭骂：“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及至他中了举人，胡屠户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其实这位贤婿的品貌并未变样，变得快的只是泰山大人的嘴脸。“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从阔起来了的人的眼睛看来，也不免会感慨系之的吧？

“一阔脸就变”与“遇阔脸就变”，虽同为变，但其形式和内容并不一样。前者升起的是骄横之气，后者现出的却是谄媚之相；前者变得颐指气使，后者变得恭谦柔顺。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又有着联系。那阔人的“脸变”，与那些并未阔起来（但心里多半是想阔的）的人们的“脸变”，实在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笑林广记》一则有关金老鼠的笑话以后说：“有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也未必做了。”实

在是对于那些并未阔起来的人们的一种箴言。

世态炎凉，是以金钱权势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和产物。按说，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只是分工的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历史的垃圾，总象幽灵一样缠着人们的头脑。所以，经常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有没有因自己或别人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其神情笑貌，恐怕仍有必要。须知，今天因阔而变脸，已不单单是个势利问题。

脸孔，是心灵的窗口。今天要做到脸孔不变，就先得为人民服务之心不变、立身处事之道不变。

1986.1.12.



戒石铭

黄炎培先生在《八十以来》中，记述他早年家乡川沙厅（当时不称县）衙门的情形说：正对着地方官大堂的前面，有一座堂皇冠冕的大牌坊，牌坊面北，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审案的大老爷们一抬头，便能看到这十六个字。他说，这是清朝地方官衙门的一般设置。

据洪迈的《容斋随笔》和赵翼的《陔余丛考》等书载，这十六个字源出于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原文有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后来宋太宗赵光义从中摘取了上述四句十六字，命人写了颁行天下。到了南宋，高宗赵构又以黄庭坚所书这十六字，“颁于州县刻石”。看来这四句原来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叫《戒石铭》。

《戒石铭》是皇帝用来戒饬官吏奉公守法，以利于维护其统治之久远的。洪迈说是表现了帝王的“爱民之心”，固然天真，但如果官吏们真的能把它心铭力行，对老百姓多少还是有益的。实际上，封建官吏们也许天天看着它，却总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照样贪婪残民，所以它终究不过是官样文章。后来有人在铭文的每一句后面又各添一句，成了八句三十二言：“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使一篇堂堂皇皇的“御制”成了绝妙的讽刺文字。这大概是那些帝王们始料所未及的吧！

但仔细琢磨一下，那十六字真言的本身实在早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尔俸尔禄，民膏民脂”，那么皇帝陛下的宫殿陵寝、嫔妃侍从、四方贡品、内库宝藏，又哪一样不是民膏民脂呢？“下民易虐”，这倒是极真实而坦白的招供，但为什么会如此呢？却无法答复。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就只能是靠“上天难欺”。而这“上天”，无论是指冥冥中的神，还是身居九重的人，又确实是“他又怎知”的，更不用说那些昏君们，知道了也未必便会怎么

样。《戒石铭》以及皇帝们的其它种种儆戒之词（如“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所以都命运不佳，是封建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

今天，《戒石铭》一类的东西，自然全不适用，但我们也需要并且已经颁发了一些有关的法律、法规、守则、条例，作为各级干部行为的准绳。它们的效力将如何呢？我想靠“上天难欺”是必要的，领导机关应该经常深入下层，检查贯彻；而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下民易虐”的情况。虽说今天的老百姓，已不再是什么“下民”，而是国家的主人。但如果有的官僚主义者并不把老百姓当作主人，或者某些老百姓还不善于运用民主与法制的武器，那就仍不免会出现“下民易虐”的情况，而那些法规、准则，也就会失去应起的作用了。

1986.1.17.



也说“难得糊涂”

不久前，读到公今度同志的《“难得”也不要“糊涂”》一文（见《中国青年报》1985年11月16日2版），勾起了早先沉落在心底的一点思绪，终于下决心把它写出来。

公今度的文章，是从郑板桥的一方闲章“难得糊涂”说起的。我没有见过这方闲章，更不知道这位怪人镌刻这枚闲章的时间和背景。对这四个字应作何理解，是否属于他的“自诩”，不敢妄说。但据鲁迅说：“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我见到的有关拓片，在“难得糊涂”这四个大字下面，还有几句话：“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据此看来，这“难得糊涂”的“难得”二字，似乎既无“难能可贵”之意，也不好作

“偶尔”来解释，它的意思大概接近于“不易”，就是说，想要做浑浑噩噩的糊涂人，却又难于做到。

郑板桥是个仕途上不得意，而又颇有些正义感的人。他在山东潍县当七品官时，有一首题画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是想做点有益于地方的事的，但囿于情势又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内心矛盾，“进又无能退又难，官途局蹐不堪看”。所以这“难得糊涂”，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个正直的士大夫的徬徨与苦闷。

我之所以早想就“难得糊涂”说点什么，是因为郑板桥的那张拓片，现在似乎颇为流行。它陈列在文物商店里，悬挂在一些人家的屋子里，有的出版单位还曾拿了来作为赠送作者的礼物。人们在欣赏板桥的书法之余，未尝不受到那人生哲学的濡染。或者兴趣竟在那字义上，而并非看重其书法。我虽不挂那拓片，但坦率地说，那四个字在自己的思想里，却也曾经引起过某种共鸣。看到党风、社会风气尚未根本好转，不正之风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还颇有争新斗奇、愈